

“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 价值链的构建*

——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视角

马 涛 陈 曦

【内容提要】 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为研究“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是影响“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的重要正向变量,中国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企业是其构建的微观主体。当“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国际公共产品与价值链构建主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实现供求均衡,也就为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扩展创造了必要条件。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将在提升包容性发展、收入分配公平性、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国际经济治理重构等方面创造重要价值。在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一些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持审慎甚至敌视态度并形成了错误认知和偏见,这可能成为影响价值链构建的负向变量。同时,一些参与现有全球价值链的沿线发展中国家也会面临价值链融入路径的选择。考虑到“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内涵的国际公共产品满足了全球化时代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需求,发达国家也能弥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角色缺位,不会成为“一带一路”价值链构建中的阻碍,将与发展中国家发挥各自互补优势,实现合作共赢。

【关键词】 “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公共产品供求;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

【作者简介】 马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邮编:10073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0)04-0131-24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当今云谲波诡的世界格局下,全球范围内已经成熟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主要包括北美、欧洲和亚太三大价值链体系。全球生产网络促进了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分工合作与商品流通,提升了经济产出并繁荣了全球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全球价值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2008年之前,全球价值链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份额最高值接近52%。危机后该份额出现下滑,2015年降至约47%。^①在逆全球化和结构性因素导致全球价值链收缩的背景下,各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开拓新的价值链体系,以提供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在2015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强调,要共建“共享协调、开放、包容的全球价值链”。^②同年,二十国集团(G20)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提出了有关构建“包容的全球价值链”的倡议。^③此后,2016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发布了G20历史上首份贸易部长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中国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出了“促进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的倡议。由此可见,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inclusive global value chains)成为扩展全球价值链体系并确保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给出了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核心概念,主要是指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企业通过克服参与障碍能够便利融入的全球价值链。^④其中的参与障碍主要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国内缺乏支持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和体制,导致了较高的固定成本以及在国际市场竞争上的巨大挑战。作为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微观主体,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企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积极

^①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World Bank, 2019, <https://elibrary.worldbank.org/doi/abs/10.1596/978-1-4648-1457-0>, 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② 习近平:《发挥亚太引领作用 应对世界经济挑战》, http://china.cnr.cn/gdgg/20151118/t20151118_520536307.shtml, 访问时间:2020年1月15日。

^③ G20安塔利亚峰会公报指出:包容的全球价值链是世界贸易的重要驱动力,所有发展水平国家的各种规模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参与并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同时鼓励发展中国家更深参与并创造更多价值。参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安塔利亚峰会公报(全文)》,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1/17/e_1117160248.htm, 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④ “Inclusive Global Value Chains: Policy Options in Trade and Complementary Areas for GVC Integration by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OECD and World Bank Report prepared for submission to G20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Istanbul, Turkey, October 6, 2015, <http://agris.fao.org/openagris/search.do?recordID=US2015601240>, 访问时间:2019年12月20日。

利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相应平台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

由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结构固化”导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发展动力不足等原因,全球价值链需要继续扩展并寻求在全球范围均衡分布。例如,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失衡和“缺位”特征。一方面表现为缺乏统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表现为该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难以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种新的导向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这种缺位。^① 长期以来,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出“东强西弱”的特征,通过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引领中国与相关国家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向西逐步延伸并不断深化。

经过几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相关国家间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截至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岗位。^②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要扩大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归根结底还要加强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深度产能合作。那么如何实现这种深度合作?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来实现。从微观角度来讲,构建价值链体系需要吸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企业,使它们通过深入参与国际分工创造经济增长,消弭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在当前世界发展格局下,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依托是什么?“一带一路”建设迎合了全球价值链体系扩展的需要,也满足了沿线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需求。“一带一路”不仅为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提供了路径选择,也能为其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且通过生产性服务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发挥作用。

本文从国际公共产品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对包容性全球化的具体内容,即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进行了研究。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国际公共产品,价值链构建主体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实现供求均衡,为价值链构建创造了必要条件。其次,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在促进包容性全球化方面深具现实价值。最后,也应看到,主导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部分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全球化发展的错误认知可能会形成价值链构建的负面因素,应该积极予以化解。

① 李向阳:《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缺位”与“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39页。

②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2019年度报告》,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二 现有相关研究

在现有的文献中,学者们对“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公共产品关系的研究较多,而“一带一路”与全球价值链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对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理论阐释主要分布于 OECD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中。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最早由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en)在1971年提出。^①1999年,英奇·考尔(Inge Kaul)等人给出了国际公共产品的定义:国际公共产品就是其收益扩展到所有国家、人民和世代的产品。^②区域公共产品从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发展而来,意指仅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供给和消费,其利益惠及整个地区而非遍及全球的国际公共产品。^③奥利弗·莫里西(Oliver Morrissey)等认为公共产品的定义不应过于宽泛,其重要特点是具有跨越国际边界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意味着公共产品一旦提供,没有人会被排除在享受权益之外;非竞争性是指一个成员的消费不会引起其他成员消费的减少。^④在一般意义上,“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整体平台,在这一平台上的诸多跨国活动具有区域公共产品属性。^⑤但目前“一带一路”在初级阶段被赋予过多多边主义属性是缺乏可行性的,而应赋予其区域主义属性,同时也并不否认“一带一路”最终要具有多边主义属性。^⑥鉴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是国际合作与交流,^⑦从长远看,“一带一路”建设所提供的是具有区域属性的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器物型、制度

① Mancur Olsen, “Increasing the Incentiv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5, No.4, 1971, pp.866-874.

② 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A. Stern, “Defining Global Public Goods,” in 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A. Stern, eds.,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

③ 樊勇明:《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公共产品——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44页。

④ Oliver Morrissey, Dirk Wille Velde and Adrian Hewitt, “Defin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Conceptual Issues,” in Marco Ferroni and Ashoka Mody, eds.,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Incentives, Measurement, and Financing*,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p.31.

⑤ 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142页。

⑥ 李向阳:《“一带一路”: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46页。

⑦ 2017年5月和2019年4月,在中国北京分别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型和观念型公共产品的保障。^① 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是对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补充,其理论来源是经济学中的地区性公共产品的概念,即把区域内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设计一套只服务于本区域、只适用于本区域,其成本由域内国家共同分担的安排、机制或制度。^② 黄河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提出的“嵌入式公共领域”概念的基础上指出,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或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情况下,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将会驱使区域及区域间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联合起来,共同设计一套制度安排。^③ 基于此,“一带一路”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为改善相关国家的经济治理以及构建以价值链体系为核心的区域秩序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增加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带动沿线发展中国家实现包容性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将相关国家联结在一起,通过项目投资、对外贸易、资金保障、能力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合作内容,为它们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遇。^④ 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将有效实现全球包容性发展,为促进区域内收入分配、生态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等方面的公平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国际公共产品。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包容性全球价值链

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到2050年,“一带一路”倡议将贡献80%的世界经济增长,新增30亿中产阶级。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倡议将新增2.5万亿美元的贸易量。^⑤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国际合作涵盖中国、东盟、南亚、中亚、西亚、独联体和中东欧,^⑥ 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已延伸至非洲、拉美以及南太平洋。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初级阶段,逐步形成了中国向相关国家进行投资并购、承包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商品贸易以外的合作。随着产能合作的不断深入,相关国家将在中国进行投资性生产等经营活动,以形成“履带状”循环运行的全球价值链新结构。

“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价值链理论具有推进和创新效应。“一带一路”倡议打破

① 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谢来辉:《“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一个类型学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第34页。

② 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11页。

③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87;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141页。

④ 朱磊、陈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内涵、目标与路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90页。

⑤ 王义桅:《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9月21日。

⑥ 2013年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有65个。

了传统区域价值链的地域限制,更强调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一带一路”将中国优质产能、技术和价格优势与广大亚、欧、非国家的市场、劳动力和发展转型等需求结合起来,通过各个层面的战略对接来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实现要素资源在亚、欧、非国家新的流动和分配,有助于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①特别是在亚洲,“一带一路”为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延伸创造了条件。当前,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不仅面临着价值链长度缩短的挑战,还可能受到“特朗普冲击”的影响,“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产能合作将会延伸该地区的全球价值链。^②

世界各国为构建更包容的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更好的政策环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多数参与国尚处在全球价值链的初级阶段,相关国家可以利用自身制造业产能优势,帮助中资企业与“一带一路”合作对象国在资金、技术、基金、项目和产业园区等方面深度对接。^③在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深度对接上,构建“一带一路”为核心的价值链,能在国家产业竞争力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择某些特定产业进行互补性的分工合作。^④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是全面建设呼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微观经济机制的基础,而且是基于公平贸易上的、全球各国参与主体都能受益的包容性全球价值链。^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国形成了经济技术联系和利益纽带。

融入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比较优势参与价值链分工体系。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参与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而来自较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则会承接高技术密集的专业化活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上下游分工,会为其带来生产率提高、产品复杂度提升和出口多样化等诸多经济收益。^⑥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变革为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创造了重要的政策环境。由此可见,不同国家推进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进程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小企业是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微观主体之一,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

① 王亚军:《“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创新与典范价值》,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第9页。

② 李向阳:《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缺位”与“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43页。

③ 刘志彪、吴福象:《“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32页。

④ 周绍东、邵俊杰、罗金龙:《以“一带一路”为核心构建区域价值链:比较优势与产业选择》,载《经济论坛》,2017年第3期,第137页。

⑤ 刘志彪:《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载《经济参考报》,2019年7月24日。

⑥ Przemyslaw Kowalski, et al., “Particip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mplications for Trade and Trade-Related Policies,” in OECD Trade Policy Paper 179,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5.

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变量较多,有学者认为,产品质量、金融稳定、标准和认证、灵活度和适应度、创新能力和营商环境等都是中小企业融入价值链的潜在影响因素。^①此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OECD、世界贸易组织(WTO)、APEC和东盟(ASEAN)等国际组织在研究中全面总结了影响中小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的变量因素,但是,各国际组织对变量的采用标准也不尽相同(见表1)。其中部分变量直接或者间接反映出中小企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时对一些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

表1 各国际组织对中小企业参与价值链的影响变量研究情况

影响变量 \ 国际组织	UNCTAD	OECD	WTO	APEC	ASEAN
产品质量	×	√	×	√	×
产品价格	√	×	√	√	√
产品配送	×	√	√	√	×
电子通信的使用	×	√	√	√	×
国际认可的质量认证	×	√	×	√	×
国际标准	×	√	×	×	×
信息和通信技术	×	√	√	√	×
电子化市场	×	√	√	√	×
金融稳定	×	√	×	√	×
商业惯例的变化	×	√	×	√	×
人力资本(人力资源)	×	√	×	√	×
生产分割	×	√	√	√	×
供求关系	×	√	√	√	×
价值链内的合作	×	√	√	√	√
与跨国公司和大公司的合作	×	√	×	√	√
结构与政策特征	×	√	√	√	×
营商环境	×	√	√	√	×
生产能力	×	√	×	√	×
实物和信息化基础设施	×	√	√	√	×
灵活性和适应性	×	√	×	√	×
地理位置	√	√	√	√	√
创新能力	×	√	×	√	×

资料来源:Asia Development Bank, “Integrating SMEs into Global Value Chains: Challenges and Policy Actions in Asia,” Mandaluyong City: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5,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integrating-smes-global-value-chains?>, 访问时间:2020年1月15日。

注:×表示该变量不包含在国际组织的研究中;√表示该变量包含在国际组织的研究中。

^① Yuhua Zhang, “Integrating SMEs into Global Value Chains: Policy Principles and Best Practices,” in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Issues Paper No.6, May 2014.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本文一方面确定了“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另一方面分析总结了现有文献对“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笔者发现,以往研究中尚没有从国际公共产品视角研究“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问题。基于此,本文设计出以下研究思路,“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给相关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能够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创造物质基础和政策环境。特别是“一带一路”为沿线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企业更好融入价值链提供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同时也诠释了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内涵。本文在分析“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构建中,不仅从国家层面探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还从中小企业的微观层面进行了探析,以期从多个视角研究价值链构建主体与国际公共产品之间的供求均衡关系,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

三 国际公共产品供求下的“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

“一带一路”建设涵盖了器物、制度和观念等多个维度,其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也可以分为器物型、制度型、观念型等多个类型。全球价值链运行需要的重要元素是服务,其中生产性服务在全球价值链构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被形象地比喻为全球价值链的“黏合剂”。1980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运输、旅游和商业服务等服务业出口在增加值贸易中的比例从31%上升至43%,^①服务业承载着各国在价值链上的多向关联。

(一) 公共产品供求下“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构建的研究架构

本文为“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框架(见图1)。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构建提供了必要且不同类型的国际公共产品;另一方面,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沿线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企业作为价值链构建主体也有对公共产品的内在需求。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国际公共产品供求双方实现平衡的条件下,“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以产能合作为功能导向的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构建。下文将以此为研究架构进行理论分析:首先,从公共产品类型角度介绍“一带一路”倡议对价值链构建的供给模式。其次,基于国家和企业的宏微观层面归纳其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情况。最后,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上分析促成“一带一路”价值链构建的必要因素,并给出结论判断。

^①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World Bank, 2019, <https://elibrary.worldbank.org/doi/abs/10.1596/978-1-4648-1457-0>, 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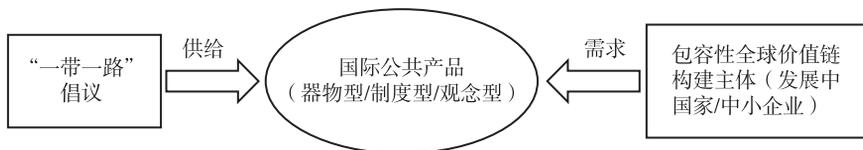


图1 国际公共产品供求下“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一带一路”对构建包容性价值链的公共产品供给

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由要素禀赋、地理位置、市场规模和体制所决定。此外,政策和制度等公共产品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手段,可以弥补要素禀赋的缺陷。“一带一路”将通过制度型和观念型公共产品给沿线价值链构建提供必需的服务平台和发展理念。此外,器物型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自由贸易区、产业园区等实体性公共产品是构建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物质保障。

1.“一带一路”为价值链构建提供的器物型公共产品

低效的基础设施是贸易成本高的重要原因。通过改善互联互通条件可以克服距离遥远的困难,促进国家参与价值链,这包括改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以及管理相关服务的监管框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等领域成为相关国家参与价值链亟须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基础设施中的公路、铁路、管线、电力和通信网等公共产品的提供成为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与上述基础设施相似,产业园区也是“一带一路”为构建全球价值链提供的重要器物型公共产品,其为进一步形成产业链搭建了更直接的平台。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沿线全球价值链的构建。过去几年,在亚欧地区和国家建设的雅万高铁、亚吉铁路、中泰铁路、中老铁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和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等项目给相关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经济红利。以建立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中白工业园(Great Stone)为例,该园区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扩大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试验田”。自2014年工业园建成以来,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园区的样板与典范,园区在提升两国产业战略布局的同时,也为沿线全球价值链构建创造了重要平台。^①所以,“一带一路”价值链正是在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设施之后,才能搭建起沿线国家之间高度关联的产能合作。

^① 2012年1月,白俄罗斯和中国批准了该合作项目的政府间协议;2012年6月5日白俄罗斯签发了第253号《关于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区》的总统令;2014年6月19日,中白工业园的奠基仪式隆重举行;2015年5月12日,两国领导人莅临中白工业园现场视察,签署“巨石”总体规划书,并对入驻园区的第一批企业进行了评估。

2.“一带一路”为价值链构建提供的制度型公共产品

制度型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是指保证、维持和拓展国家间分工与贸易的国际规则。“一带一路”各国内外部的制度环境各不相同,现行国际规则大多具有“非中性”的特征。^① 所以,这就需要建立一套适用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合作机制,建立“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国家与企业深入参与一体化协议也可以促进体制和政策改革,以提高制度质量。为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以“一带一路”国家为地域范畴,在区域内签署深度特惠贸易协定(PTAs)可以提高经贸合作的制度质量,增加成员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深度特惠贸易协定包括法律和监管框架、协调海关程序、制定知识产权规则等。此外,全球价值链对契约制度的质量更为敏感,价值链联系越依赖契约制度质量,该种联系内部的黏性就越强,所以需要建立合作信誉机制以弥补正式契约的缺陷。

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平台,2014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核心精神在于平等性和非排他性。作为新成立的国际组织,亚投行建立了公平和具有公信力的治理机制。亚投行的注册资金有1000亿美元,但其贡献不止于基建融资,而是推进世界经济秩序重构,使其更公平和更互利。亚投行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运营以来已批准项目投资约53亿美元,所有项目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力推进了亚欧一体化整合。^②

“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一系列对接合作的制度型公共产品。^③ 例如,东盟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蒙古国的“发展之路”、越南的“两廊一圈”、柬埔寨的“四角战略”、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老挝的“变陆锁国为陆联国”、菲律宾的“大建特建”规划等,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顶层设计特点的制度型公共产品。^④ 这些区域发展战略也可以看作区域规划下的宏观制度型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注重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创新。“一带一路”为相关国家融入价值链提供自由贸易区、“互联网+”平台、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合作机制和交易平台。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新设立的相关制度型公共产品主要在金融、贸易和投资等领域。例如,金融领域有亚投行、丝路基金,贸易领域有“一带一路”自由贸易网络、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投资领域有“一带一路”投资争端

① 张宇燕:《多角度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1页。

②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2019年度报告》,第10页。

③ 周信:《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9年5月2日。

④ “一带一路”倡议还出台了六大经济走廊规划,包括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和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

解决机制、“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一带一路”国别投资税收指南。上述平台为微观企业融入“一带一路”价值链提供了必要的公共产品,有效解决了企业的市场准入和投资争端解决等问题。

3.“一带一路”为价值链构建提供的观念型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政治高层对话、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文化互动,以制度性安排提供构建全球价值链的公共产品。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促进亚洲共同发展的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特别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亚洲经济一体化方向提供了崭新视角。

密切人文交流为共建“一带一路”拉紧了情感与合作的纽带。“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使沿线国家分享到文化交流、医疗合作、教育减贫、普惠金融、生态旅游、生态保护以及跨越“数字鸿沟”等红利。比如,在生态环保领域有“绿色丝绸之路”倡议、“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规划,在社会文化领域有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丝绸之路新闻合作联盟、音乐教育联盟和丝路国际智库网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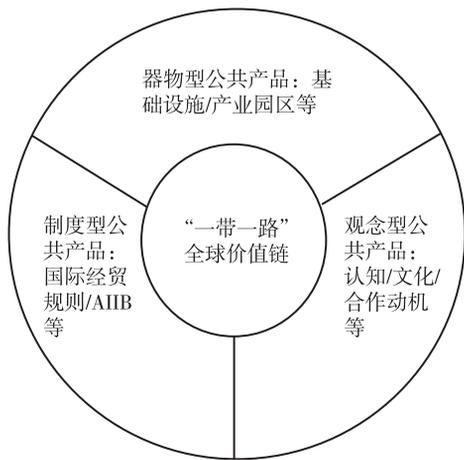


图2 “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所需国际公共产品的类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一带一路”价值链构建主体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

国际公共产品能更直接地反映本区域间不同类型国家的需求,通过深化国际合作

^① 上述一些“一带一路”公共产品的分类,参见谢来辉:《“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一个类型学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第56页。

构建全球价值链体系。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服务和制度安排更契合该地区的稳定发展乃至价值链的形成。以往对公共产品的研究多集中在如何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相对忽视了地区成员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基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假设,可将区域秩序视为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市场中各行为体互动的结果。^① 所以,本部分从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主体,即从国家和企业层面专门研究了其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范围。

1. 国家层面

发展中国家是“一带一路”国家的主体成员,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多数沿线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一是缺乏全球价值链构建所需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二是缺乏一个区域一体化发展“雁阵模式”的引领国家。相较而言,在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要素中,前者对于国家融入其中起着基础性作用。

尽管“一带一路”国家历史上形成了诸多区域合作组织,但难以满足其构建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公共产品之需。以中亚地区为例,除了上海合作组织以外,还有中亚合作组织、中亚经济合作组织、俄白哈关税同盟、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运输走廊和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等七个区域合作组织。尽管上述区域合作组织多是基于经济架构的合作组织,由于其覆盖范围和功能的限制,较难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通用的国际公共产品。捍卫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带一路”国家希望借助国际公共产品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发展导向型的国际合作机制,旨在通过对国际公共产品的共建和共享,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向相关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也与“逆全球化”国家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近些年来,逆全球化浪潮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断蔓延,直接影响了区域一体化进程。特朗普政府为达到“美国优先”的目的而减少乃至放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所以,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不仅将联结沿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也将促使发达国家继续致力于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中。^② “一带一路”国家在构建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型平台需求显著。特别是低收入发展

^① 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9页; James M. Buchanan,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Public Goods*, Chicago: Rand-McNally & Co., 1968。

^② 截至2019年10月31日,中国已经同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参见 <https://www.yidaiyilu.gov.cn/gbjg/gbgk/77073.htm>, 访问时间:2020年1月15日。

中国,有的因为之前长期政治动荡,有的是一直以来经济萎靡不振,对基础设施的重构充满期待。其中一些相关国家之间也期待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或者双边投资协定(BIT)等合作协议,以促进对外开放力度。在价值链的构建进程中,相关国家还彼此深化了产能合作关系。同时,中国和相关国家在实现包容性发展的过程中也促进了寻求共同发展的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

2. 企业层面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全球或区域一体化生产体系。多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参与了跨境生产,它们原来只依靠国内要素壮大自己,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促进自身发展。为创建促进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有效运行机制,需要政策干预。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需要获得政策优先才得以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① 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能够使相关国家中面临各种约束条件的中小企业成为领先公司,进而真正成为价值链的缔造者。

阻碍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较多,包括非关税壁垒、技术获取困难、缺乏技能劳动力和信息、贸易基础设施匮乏、无法达到质量标准、劳动力市场刚性、薄弱的制度支持、融资困难以及所在行业的劣势等。基于此,以下六个方面是中小企业融入“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需求。^②

(1) 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给中小企业提供了最基本的发展条件,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中小企业生存、成长和获得竞争力的基础。一个有利的营商环境包括经济政策、要素禀赋、监管架构、基础设施、企业文化和技术等因素。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发展和执行有效政策上缺乏技能和知识,这就需要提升本国的营商环境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整体完善的招商引资政策,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

(2) 商业发展服务:商业发展服务对中小企业来说必须是综合的、支付得起且是高质量的服务。它包含三个核心部分,即专业、可咨询和可推广的服务。其中,最复杂的部分是专业性服务,它需要辅助日常的商业运营功能。

(3) 市场准入条件:由于中小企业缺乏资源、专业技能和市场信息,一般都会面临市场准入的难题。在提高市场准入能力方面,存在四个关键因素:第一,中小企业需要

^① 这些优先政策包括:对小供应商的税收优惠、贸易便利化措施、简化的贸易程序、国内基础设施的改进、获得贸易融资、物流和通信技术变革、发展贸易走廊、针对国际标准和规则的教育与培训以及通过创新融资模式获得资本增长。

^② Asia Development Bank, “Integrating SMEs into Global Value Chains: Challenges and Policy Actions in Asia,” Mandaluyong City: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5,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integrating-smes-global-value-chains?>, 访问时间:2020年1月15日。

掌握一些关于商业机会、客户、竞争者、分配程序、当地法规和监管以及税收等基本常识。第二,需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和便利化服务。第三,降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市场准入。第四,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之间的网络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知识和技能的来源。

(4)融资水平:各国企业的融资问题都很棘手。中小企业获得足够的资金对其至关重要,在企业商业周期的不同阶段对资金的需求数量不尽相同,比如在初期或成长阶段尤其是企业转型期对资金的需求更为关键。目前,各国对中小企业实施了多种融资工具,如民间融资、内部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以资产筹资、租赁融资以及政府补助。

(5)技术创新:企业的技术创新包含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市场营销和组织等要素。尽管中小企业在研发方面的能力有限,但是可以进行一些简单、负担得起的研发活动。另一种有效的创新是技术获取和转化,国内的制度结构、支持政策以及金融辅助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获取和转化都有显著影响。

(6)企业文化:企业家推动着中小企业发展。一些关键要素决定着企业发展是否成功,包括企业的内在特质、充裕的资源、具体的商业计划、有利的外部环境以及广阔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等。企业应通过教育、培训和信息传播等方式提升对企业家身份的价值和重要性的认知。

(四) 国际公共产品供求均衡下的“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

当“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价值链构建主体对国际公共产品需求实现了供求均衡,也就为“一带一路”价值链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在此条件下,“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也就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所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将提升国家之间的协调性和包容度。

当前,相关国家不仅要继续融入由西方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现有全球价值链,还要主动扩展具有较强自主性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不仅是相关国家寻求共同发展的战略机遇,更是重构全球公平发展的历史契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为各国不同规模、不同技术水平或者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了融入全球化发展的公平、开放的快速通道。^①这也构成了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微观基础,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竞争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同时也可以参与新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并获得一定话语权。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公共产品供求均衡表明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相关国家及其企业需要一个国际治理新平台加强对外开放

^① 刘志彪:《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载《经济参考报》,2019年7月24日。

力度,“一带一路”提供的观念型、器物型和制度型公共产品满足了其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基础需求。首先,相关国家要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树立正确的认知。秉承正确的“一带一路”义利观本质上是拓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理念,凸显了以义为先、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导向。^①只有对倡议树立正确的认知,在观念和合作上达成共识,各国才会欣然接受并融入价值链的构建。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为价值链构建提供了所需的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等物质条件。实际上这些物质基础也是各国企业参与合作共建的成果,在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上搭建合作新平台。最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构筑合作共赢的制度平台,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多边协议与合作机制,更有利于价值链体系的形成。制度型公共产品就是要给相关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顶层设计,激活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主动性和活力。

从宏观经济学理论看,均衡的国际公共产品供求关系是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正向影响因素。这些决定“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因素成为创造新的全球化发展的源泉。无论是基础设施、产业园区、规则与制度平台还是观念文化等影响因素,只有需求主体和“一带一路”倡议对上述要素的提供满足双方的供求关系时,构建全球价值链才具备基本条件。从表2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所提供的各类国际公共产品能够满足价值链构建中国和企业层面的需求,基本实现了重要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

表2 “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国际公共产品供求关系

公共产品类型 \ 供求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	构建全球价值链主体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	是否满足供求关系
器物型公共产品	公共基础设施	信息化基础设施	满足
	产业园区	商业发展服务	满足
	装备制造	设备	基本满足
制度型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营商环境质量	满足
	自由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定	市场准入条件	基本满足
	AIIB、丝路基金、“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融资渠道	满足
观念型公共产品	丝路国际智库网络、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	文化与观念	满足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表中的国际公共产品供求仅做简单分类。

① 李向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义利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第8页。

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构建沿线全球价值链要充分发挥中国与相关国家经济要素的创造效应。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除要素禀赋、地理位置、市场规模和体制等因素决定外,倡议提供的各项支持政策也起着关键作用。“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实质上是接受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要素分工,即各国不再以产品优势而是以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一带一路”国家之间有的要素禀赋不同并可以形成互补优势,有的要素禀赋相似,那么高质量的要素就具有竞争优势,在有效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也有助于构建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在此情形下,“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体系中可以提升竞争力,也可以在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分配上扩大话语权。

四 “一带一路”价值链在促进包容性全球化中的价值

“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价值和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全球治理理念。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是相关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举措,它不仅有助于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扩展,也将促进区域间均衡发展。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中国与相关国家创建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也是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的基础。

(一) 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是制度型开放的新理念

“霸权稳定论”为解释公共产品与国际/地区秩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视角,该理论强调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将其与是否能够建立单一主导权联系在一起。^①“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表现在经济层面是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更是一种以国际公共产品维系的国际合作机制。尽管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都认为,霸权的存在是保证稳定的国际秩序、自由开放的贸易和市场、有效的货币体系等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必要条件,^②但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为构建全球价值链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并不是为获得合作主导权而设置,更不是霸权国家维护霸权秩序的工具,而是促进共同开放与发展的新理念,这与霸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目的截然不同。

① 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6页。

② Charles P. Kindleberg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6, No.1, 1986, pp.1-13;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与相关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建设,目的是通过国际合作拓展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以此扩大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以及设立的各种合作平台也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渠道。以往中国与相关国家以及相关国家之间的经贸交往主要集中在各自优势产品的交易层面,深度的产能合作还有待拓展。借助“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创建的制度和国际规则架构,各国促进以资本和服务为纽带的生产要素流动,在此基础上形成制度优势,扩大对外开放的经济红利。

(二) 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将有效推动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是要使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和好处惠及所有国家,使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群,特别是要惠及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国家。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就是要通过发展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和跨国生产,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

近些年来,逆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发达国家移民政策不断收紧、民粹主义泛滥等。逆全球化对全球价值链的负面影响在于削弱市场的充分融合所能带来的经济红利。逆全球化的发生说明全球化在不断加深的过程中触及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全球价值链将不同国家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配、销售等活动联系在了一起,使贸易和投资更加自由化,但却存在欠缺包容性的严重问题。这里既有增长方式的问题,也有只注重经济而忽略包容性发展的因素。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以粗放式发展换取经济增长。尽管这些国家以资源和要素投入获得了一定增长,但是也偏离了包容性发展的本质,比如社会、教育、医疗和环境等方面的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的一项重要意义正是通过弥补这些缺陷促进包容性发展。

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推动了包容性发展,将国际合作政策框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更好地激发全球价值链能够带来的积极作用。全球价值链使各国将碎片化的生产组织在一起,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可以降低包括海路运输、保险费用、税金和通信等在内的贸易成本,而政策在提高效率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①“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在政策上的融合有助于跨国公司进一步加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互联系与合作,增加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同时,通过包容性价值链的构建与完善,释放更多的

^① Koen De Backer and Sébastien Miroudot, “Mapping Global Value Chains,” in René A. Hernández, Jorge Mario Martínez and Nanno Mulder, eds.,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World Trade: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Santiago: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2014, p.46.

政策空间,在相关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带动社会、环境、教育和劳动力水平等各方面的提升。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和推动包容性发展,可以化解部分逆全球化造成的发展阻力,进一步放大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意义。

(三)“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从区域(国家间)发展的角度看,全球价值链中的成员不仅参与到生产、消费、运输等各个环节,还会在社会与政治方面逐渐嵌入同一个网络中,分享共同的信息。“公平性”对全球价值链有重要的意义。公平依赖于全球价值链成员的主观认知与社会嵌入(如地理起源、社会话语、共享价值和背景)。普遍性的公平需要综合的对话和协商,由所有成员共同参与定义普遍的标准。^①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内涵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正好能为所有参与成员和国际组织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公平”标准。“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资源有序流通、要素高效配置、需求深度融合,使劳动力效率得以提高。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融入“一带一路”价值链,可以使其参与收入分配公平性问题的各项标准制定,由此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的劣势。

从国内发展的角度看,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以粗放式发展换取经济增长。尽管这些国家以资源和环境投入获得了一定增长,但是也偏离了包容性发展的本质,可能带来环境恶化等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有很大难度。“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带来了利益分配变革的空间和可能性。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中有进行产业升级、由低端向高端转变的潜力。同时,国际分工的新变化可能对收入分配的格局产生一定影响。“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相关国家实现转型升级,改变其部分产业空心化、行业泡沫化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状况,实现价值链参与国内收入分配更趋公平。

(四)“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构建有助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

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贸易与生产逐渐围绕全球价值链的构成形式展开,很多国家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全球价值链。^②全球价值链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际经济秩

^① Jutta Kister and Fernando Ruiz Peyré, “Increasing Fairnes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Fair Trade Standards for the Agricultural and Mineral Sector,” in Melanie Pichler, et al., eds,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Natural Resource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6, p.2.

^② Anna Ignatenko, Faezeh Raei and Borislava Mircheva, “Global Value Chains: What Are the Benefits and Why Do Countries Participate?” IMF Working Paper, 2019,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19/01/18/Global-Value-Chains-What-are-the-Benefits-and-Why-Do-Countries-Participate-46505>, 访问时间: 2020年1月15日。

序。“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对于重构国际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重新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改变以往的劣势地位。“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重构全球价值链、拓展中国与相关国家产能合作范围的契机。基于比较优势,中国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核心,将相关国家的产能合作有机结合在一起。借助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有利地位,“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可以真正带动相关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挥潜在优势。发展中国家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其减少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原有结构。

其次,“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给各国中小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有利于改变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权力不断扩张的趋势。一方面,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拥有重要主导权,它们通过供应链网络和服务外包等多种渠道推进全球化生产,以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和全球产业布局;另一方面,大型跨国公司依靠垄断资本、先进技术、高端人才等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极大优势,甚至在某些方面,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所拥有的权力可以达到与国家相抗衡的程度。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往往举步维艰,生存空间遭到挤压。“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其特点之一是具有普惠性,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正是这种普惠性的表现。“一带一路”能够提供大量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和金融服务。中小企业借助“一带一路”提供的宝贵机遇发展壮大,可能改变全球价值链参与者的权力分布,从而影响整个国际经济秩序。

最后,“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将对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产生影响,为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做出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面临严峻挑战。美国近年来退出了一系列多边体系和协议,减少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尤其是在国际贸易中屡屡破坏现有规则的行为使多边机制的持续运转面临严重危机。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向来占有重要地位,并且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制定,这也是造成国际经济秩序转变的重要原因。“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提供了新的全球化平台,在生产、服务和税收等方面将逐渐改写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到更多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内涵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其努力制定一套为相关国家所接受的治理规则,进而可以协调其内部利益,提高运转效率。这样的转变不仅有利于带动整个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也会推动国际经济秩序依然 在多边主义的基础上向好的方向转变。

五 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对“一带一路”价值链构建的影响

与广大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热切期盼形成对比的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严重分裂。一部分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欢迎并选择加入,而另一部分则持保留甚至敌视的态度。从价值链的角度看,这种不同反应来自“一带一路”价值链的构建对主导现有三大价值链的西方发达国家产生的冲击。沿线发展中国家也不乏参与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国家,这将对“一带一路”价值链构建产生一定影响。

(一) 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的担忧

第一,“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的构建不可避免地会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影响。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现有的三大全球价值链与这一秩序有密切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占据产业发展的优势。“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坚持的是与“一带一路”倡议一致的精神,致力于使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国发展互利互惠的贸易投资关系,构建一种更为公平、公正的秩序规范。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重塑世界秩序的企图,并将其视为对现有地缘政治的挑战。上述认识产生的本质原因在于西方国家担忧“一带一路”倡议是颠覆西方国家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工具。美国某些势力对“一带一路”倡议持“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论”“中国版再平衡战略论”“中国经济自我救赎论”“中国新怀柔政策论”等错误认知和偏见,^①进而传播“债务陷阱”“环境破坏”“投资加剧腐败”等阻碍“一带一路”推进的论调。

第二,“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将使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依托于中国不断发展的金融机制扩大影响力。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家金融机构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快捷便利的金融信贷服务,使这些企业在与外国公司竞标时更具竞争力。这种战略性政策对国外的跨国公司造成了直接的竞争压力,亦会动摇现有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在政治领域,对于中国来说,如何通过提高和利用对“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来保护中国海外利益、推进国家长期发展布局是十分重要的课题。中国采取相应的周边战略会使中国对“一带一路”

^① 马建英:《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第107—115页。

各国政治影响力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这一后果令一些西方国家颇为忌惮,甚至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常的贸易投资往来也容易被解读为以“对外援助”的方式进行结盟。“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的构建使西方国家的影响力相对下降,难免引起一些国家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忧虑。

第三,“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是中国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和治理模式的重要工具。从技术层面来说,“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打造的全球物流和运输网络被认为能够重塑全球航运和物流模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产生集群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发展。^①从理念上来说,“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观和治理观。“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强调彼此互联互通,加强区域间和国际间产能合作,以谈判谋求共识、积累信任,促进更加团结有效的国际集体行动。这样的发展和治理观不以强迫改变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为前提。“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能够在各国多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基础上,推动高质量发展,这对以往西方倡导的发展模式会造成一定冲击。

(二)“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将带给发达国家新的机遇

尽管一些发达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现有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秩序有一定的冲击,但还是有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会带来务实合作的西方国家愿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例如,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都积极欢迎“一带一路”倡议;希腊通过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扩展至“17+1”的格局;葡萄牙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西欧国家;意大利成为七国集团中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德法等欧洲大国虽然未确认加入,但都强调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必须是互惠的,这意味着双方应相互给予同等程度的市场准入。总体来看,欧盟各国愿共同采取行动与中国进行商业交往。

之所以仍然有不少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保持审慎的欢迎,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对于发达国家同样具有吸引力。“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满足了全球化时代各国普遍的需求。

首先,许多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全球价值链提升各自的贸易增加值,“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可以满足这一需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显现。跨国公司逐步将技术创新和研发环节配置到了拓展本地区规模的新兴经济

^① “Global Shipping and Logistics Chains Reshaped as China’s Belt and Road Dreams Takeoff,” <https://www.hellenicshippingnews.com/global-shipping-and-logistics-chains-reshaped-as-chinas-belt-and-road-dreams-take-off/>, 访问时间:2020年2月15日。

体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应对之策是以本地化取代国际化倾向,采取推动“制造业回流”等措施。^①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解决结构性矛盾带来的问题。这是一个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发展挑战,各国政府决策者都需要考量人员技能发展、收入机会、就业和积累。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性质和特征不断改变,灵活性和反应能力是有效决策的关键,良好的公私伙伴关系成为成功政策的支柱。^②融入“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是通过更广泛的国际协调提高有效决策能力并扩展公私伙伴关系运作空间的一个机遇。

其次,“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能够带动更平衡的地区发展,在产业升级的同时推动可持续发展。生产与消费的提升对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传统的增长模式和自然资源消费方式已经逐渐变得不再适应正在变化的世界。这些问题需要依靠政府治理和商业活动共同解决,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其具有的社会包容性和分配公平。就全球价值链来说,确保制造和组装产品的企业公平分享利润,创造一个适合中小企业参与的供应链,不被成本高昂、管理混乱的环境束缚,对于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③发达国家同样需要解决生产和消费需求上升带来的压力,保证可持续发展,加入“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为解决各国的难题提供了契机。

最后,在国际秩序发生重构的战略机遇期,“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符合多数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全球治理体系近年来遭遇了诸多挑战,尤其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正在被动摇,多边主义面临危机。美国退出了若干重要多边机制,甚至 WTO 争端解决机制也因美国的行动而“停摆”。然而,世界其他国家仍然普遍赞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也是全球化能够继续推进的有力保证。“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如以往那样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规则,而是尊重所有国家的权利,推动建立统一的规则和争端机制,解决全球治理中的实际问题。正如习近平所说,“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④“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

① 张辉:《“一带一路”为提升全球价值链提供强劲动力》,载《经济日报》,2019年7月17日。

② Pascal Lamy, “Forward,” in Deborah K. Elms and Patrick Low, eds.,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Changing World*, Geneva: WTO Publications, 2013, p.xviii.

③ Victor K. Fung, “Preface,” in Deborah K. Elms and Patrick Low, eds.,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Changing World*, p.xxi.

④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重要部分,它致力于提供更趋统一的规则 and 标准,符合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需求。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在全球治理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现有价值链体系对发展中国家融入“一带一路”价值链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普遍持欢迎态度。当然,发展中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也面临一些不可忽视的挑战,现有全球价值链产生的影响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之前已经直接或者间接融入了现有全球价值链。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流动中的参与度将不断加深。^① 但是,现有全球价值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存在不足,例如缺少创新驱动、产业链“低端锁定”、受西方法律法规的不合理制约等。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利益除了改变其在现有价值链体系中的低端地位,还能推动发展中国家进行创新,逐步摆脱以往西方主导的机制束缚,获得更大的政策协调空间。

“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与现有的全球三大价值链并不冲突。它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弥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足或空白。但是要想真正融入其中,发展中国家也须在“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中探索出最适合各自发展的道路。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协调参与“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与参与其他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关系,维护与不同合作伙伴的关系;另一方面,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则应积极寻求承接“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转移,以“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为契机,融入更广阔的世界市场。

“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带给沿线发展中国家的不仅是对各类要素禀赋的优化配置,还能带来发展中国家相应政策制定空间的拓展。这也是为何“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虽然是新兴的国际公共产品,但与其他全球价值链相比,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将不会成为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价值链的羁绊,后者能够提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所需的国际公共产品,符合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尽管存在质疑和误解,“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所带来的机遇和红利会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①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 <https://www.mckinsey.com.cn/wp-content/uploads/2019/04/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及价值链的未来图景-中文摘要.pdf>, 访问时间:2020年1月15日。

六 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六年多来,促进了相关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加深了相关国家的产能合作。在此基础上扩展全球价值链体系,得益于“一带一路”提供的全方位公共产品基本实现了供求均衡。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将是促进包容性全球化的有效路径,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更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典范价值。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成为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变量,中国与相关国家为此要提供更多机制设计和政策保障。在观念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终极目标。在器物型公共产品上,中国与相关国家要为打造包容性价值链进行务实合作,提供产能合作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和物质保障。在制度型公共产品上,相关国家要在经贸领域达成多边合作协议,为制度型开放提供更多的服务平台。中国与相关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企业是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的微观主体,要满足国家和企业不同层面的公共产品需求。优化设计上述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是加速“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的重要保障。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萎靡不振,构建“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是新一轮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与相关国家通过开放与合作进行经济治理的有效途径。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与治理平台下,“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要借助价值链体系扩展的战略机遇期,积极参与新型治理体系和国际规则的构建,并提供智力要素和公共产品,筑牢国际规则和治理的话语权。同时,“一带一路”参与国要积极宣传构建全球价值链在促进包容性全球化、收入分配公平性、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国际经济治理重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还要有效化解一些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误解和偏见,避免其成为发展中国家寻求高质量发展的掣肘。此外,一些参与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一带一路”相关发展中国家也会面临价值链融入路径选择的挑战。当然,它们也期待发达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国际合作弥补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构建的角色缺位,从中发挥各自互补优势并获得经济红利,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坦言之,“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是一个长期过程,不会一蹴而就。纵观现有世界三大价值链体系,都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不断完善和成熟起来的。“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引领众多发展中国家扩大开放并深化合作,其间将会面临许多困难和风险,只有参与国互信互利、加强合作才能化解“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各种挑战。